

(2009-08-28 04:25:07)[[编辑](#)][[删除](#)]

下面是转载陈去病的小儿子陈绵康和孙女陈艺在 1989 年纪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暨先父陈去病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的文章：

陈去病是南社三位主要发起人之一。1874 年 8 月 12 日（清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一子时）生于苏州市娄门内平江路庆林桥旅次，故初名庆林，字佩忍，一字伯儒，号汲楼，别号巢南，亦曰病情，自署垂虹亭长，晚称勤补老人。祖籍浙江兰溪，元末至正午年间，方国珍在黄岩起兵反元，陈氏先祖僻乱迁来吴江，先承世业锻铜为熏炉，名大著，数传更榨油业。至明中叶，由黎里而周庄，清乾嘉年间，曾祖由周庄迁青浦诸巷，至祖父时自诸巷迁吴江芦墟，再迁同里，仍事油粕制造，“不屑仕宦”，不思“攀附”。

陈去病一生的行为，受青少年时期教育影响颇深。他本是遗腹子，9 岁是叔父去世无后，又兼承祧祀。生母、祀母同心督教严，重孝友仁义侠直。15 岁起，从著名学者长洲诸杏庐先生执经就学五载，“自经史以外，旁及两汉三唐，文章词赋靡不搜讨迨遍，攻读无余，尤长于经世大略，慨然有揽辔澄清之志”。21 岁时补吴江县学生，明年科试优等补廪。时值甲午战败，清廷丧权辱国，他极为痛心，旋即与金松岑、蔡治民等创立雪耻学会，以唤起民众为己任。戊戌政变和庚子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再次使他感到国家民族之图存，不能寄期望于变法维新，而必需进行革命。1903 年春，他怀着“梦魂蚤落扶桑国，徒侣争从侠少年”的壮志，到了被当时中国进步青年视为学习西方强国富民比较好的日本，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很多激进的爱国志士，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庚子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使陈去病由拥护康梁变法维新转向革命，而在日本几个月的斗争活动，则确立了他革命一生的牢固基础。1903 年夏秋间，陈去病回到上海，在爱国女学任教。

陈去病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先后兴办过东江国民学校、竞雄女校，执教于爱国女学、徽州府中学、绍兴府中学、浙江法政学校、东南大学、持志大学，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大汉报》，担任过《江苏》、《警钟日报》、《中华新报》、《越铎日报》的主笔、编辑，在《国粹学报》、《民报》等发表了大量文章，搜罗了众多的乡邦文献、明清史料，整理或编著了《陆沉丛书》、《正气集》、《清秘史》、《五石脂》、《吴长兴伯遗集》、《吴赤溟先生遗集》、《松陵文集》、《吴江诗录》、《笠泽诗征》等，著有《百尺楼丛书》、《浩歌堂诗钞》、《巢南文集》、《病情词话》等，还有不少未及刊印的，原托交柳亚子、范烟桥先生，惜几经战乱，不知安在？同时，他又很重视会党的作用，与光复会、兴中会关系密切，与秋瑾、徐锡麟、王金发等都过从甚密。他还多方结社，组织了雪耻学会、匡社、秋社、越社、神交社、南社、黄社等等。陈去病提倡戏剧革命，也组织过多次推翻黑暗社会，推翻反动势力统治的武装起义。可以说，他的活动遍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新闻、宣传乃至经济建设诸方面。而这一切活动无不围绕革命这一首要任务。虽几经挫折，几遭厄难，其志不移。1905 年 3 月，《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被封，工作人员被捕，他当时恰巧不在上海幸免于难。事后，他写有“吾舌尚存笔尚健，阳秋著述未嫌烦”之句。1908 年 7 月，他准备邀众去祭奠秋瑾烈士。时，清浙江巡抚正悄悄向他们张开捕网。走僻乡之后，他诗赠柳亚子话别。诗曰：“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达了他为革命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和坚信革命必胜的高昂激情。

成立于 1909 年 11 月 13 日的南社，陈去病不仅是积极参加者，而且是主要发起者及组织者。

1987年5月28日至31日，在苏州举行的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南社发起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再次一致确认南社领导人的排列次序是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和姚石子，可见陈去病在南社创建和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南社的酝酿成立和诞生，就其表面来看，在陈去病先生的《南社杂佩》中有“南社者，去病与吾苏高旭、柳弃疾三子所以继东林、复社之志业而与焉者也。故其始之取友也尚狭”之说。其实，南社成员中聚集了众多的同盟会会员。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参加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就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到辛亥革命前夕，南社社员发展到228人，“既而革命军兴，南都建国，繇是四方贤豪华集吴会，而社友乃益盛遍中国矣”。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法、东江平叛、北伐战争，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南社的许多成员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蔡元培、廖仲凯、何香凝、杨杏佛、李根源、柏文蔚等，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有一个时期，国民政府五大院院长及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是南社社员。从举行雅集，出版《南社丛刻》等看起来，南社是个文学团体，实际上南社成员最大量、最日常的活动是从事政治、军事、文化、宣传、新闻、外交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革命活动。因此，南社的活动从一开始就越出了“东林、复社之志业”，也不仅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而是和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几复”、“犄角”都只是为了便于从事革命活动的掩护之词。从“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及誉南社为同盟会的宣传部，甚至“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都点明了其间关系之深，点明了南社的本质。

革命是个极为复杂曲折艰巨的过程，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斗争方式常会随之有所变换，而当此不为人们所理解时，往往易遭到不应有的误解。陈去病也曾遭到过类似的非议。1907年冬，陈在一次酒后醒来所写二首诗中，提到了梦见穿着“先朝儒服”。即此，曾被人认为“是代表封建制度的”。其实，这时的陈去病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了兴中会、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直接从事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的革命活动。当时的清朝，尽管处于极其腐败，大厦将倾之际，但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既容不得一丝改良，对革命的镇压就更是极其残酷了。这样，革命者不能不利用一切有利于推翻满清的手段——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地下的、和平的、武装的、大规模的、单独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达到革命的目的。陈去病着力研究南明史，大量编撰明末抗清志士的遗著，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诗文，并且接二连三地结社，正是利用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民自秦汉以来，对外族的抗拒、反统治心理，特别是满清入关后的残暴屠杀，在人民中造成的反抗心理。该诗末句提出“易服焚巾应有事，腐儒何用一徘徊”，号召人民坚决起事，正说明他以历史为武器，利用人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内容来达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的。这种做法，实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斗争策略。

此外，从陈去病1903年参加拒俄义勇队，1904年谴责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立场所写的“大盗入室，主人酣眠，其亡，我中国人民有不为再重奴隶者乎？”到1911年，在《对内讦者直悲感》中所说：“盖彼袁世凯者……以倾覆我垂成之绩，以褫我独立之旗，以遂其黄幄左纛，帝国立宪之雄图”；《大汉报》发刊词“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族之成，并提倡民生主义，以亟图社会之升平，获共和之幸福。”在《吴中水利议》，以及由陈去病领衔的《南社临时召集广告》所述：“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惟建国伊始，一切事宜正资讨论，亟应组织共和政党，以策进行。”可以看出，他不仅很早就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统治结合在一起，不仅“鼓吹民族主义”，而且积极提倡民生主义，主张共和，并强调要以建立政党来领导和推进革命。其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之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因此，“倘然孙先生肯做朱洪武，他（指陈）是会奉命不遑的吧。”这样的“笑话”及“倘然”的设想也充实无由发生。若取其意，谓陈去病对孙中山先生感情之深厚，事业之忠诚，这倒是符合事实的。武昌起义前，他没有因各地起义频遭失利而消沉；10月举义后，汉阳失守，他奋臂大呼：“沉舟破釜，拼死力争”；临时政府成立

后困难重重，他反对和袁世凯妥协，继而参加“二次革命”。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考察浙东，他辞去浙江省府秘书之职追随左右。孙先生有“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子去病与焉……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之感慨。继而，他在甬东组织起义响应护法；次年赴粤任参议院秘书长。1922年，从中山先生于韶关行幕，任大本营宣传主任。他豪情满怀，“杖策从征亦快哉”，“饶鼓从容赋北伐”。陈炯明叛，他临危脱险北上。中国国民党改组，他奉中山先生命任江苏临时省党部执委，并邀柳亚子先生出来一道工作。旋为响应中山先生反对直系军阀之策略，组织江苏民治建设会，驱逐盘踞江苏之直系军阀。总之，凡中山先生需要他为之的，他总是竭尽全力，不惜毁家纾难，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柏文蔚、于右任、马君武、田桐、叶楚傖、柳亚子等《为陈佩忍先生五秩征文启》一文曰：“民国肇建，始游湖湘，旅北行，出居庸关，慨然有经略满蒙之志。癸丑讨袁，从故人于留都，颇有所规画，顾功卒无成。自是窥姑胥，谋甬东，凡东南有大征讨大建设，君无弗予焉。又累从今大总统孙公于粤东，视师浚江，抚循前敌，驰驱戎马间，几不知劳瘁，洵可谓据鞍双鬢铄，壮志未衰矣。”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他悲痛至极，在挽联中写道：

题榜铭碑慈母累承褒大节

南羲北驾不才空自怨三生

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时，他因病未能参加，又写下了《总理奉安病不克赴诗以记哀》，诗中有“感恩知己今安在，神烈峰高泪满颐”之句，真挚地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情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发动革命叛变，国民党右派对孙中山先生遗忘假拥护，真反对的面目暴露无遗，使陈去病对时局有了深刻的认识，进而对蒋集团采取不合作及反对态度。他是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12名委员之一。4月17日，葬事筹委会决议增加蒋介石等7人为委员，他即辞去委员之职。后，要他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又拒之。继而藉酒抨政，“醉必纵论党国诸公，不少讳焉”。呼曰：“晚近民生之凋敝，伊谁之过？当改称中华民国曰中华官国！”到1932年（58岁时），他尽辞诸职，退归故里。1933年10月4日（农历癸酉八月十五日午时）病患痼疾骤剧不治，逝于同里。南社诸友及故旧门生金议于1935年11月10日，公葬于苏州虎丘南冷香阁下，以示他创南社于此，又曾集会于冷香阁之意。

陈去病的一生，看来似乎以辛亥革命前后为两个阶段，后期不如前期那么轰轰烈烈奋发有为，“才名满天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两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形势有很大不同有关，一方面也和他的家世“希荣慕利之念寡”有关。他在给柳亚子先生的信中就提到：因循数载，第三过广州，遇觉生。问：“君欲官乎？”弟直答之曰：“否！”……维时总理欲留弟同赴桂林，弟以北伐筹备需时，乃请以暂归候命。于是总理遂授弟一散秩，以状交溥泉、梓琴转付，即大总统府咨议是也。联系《为陈佩忍先生五秩征启》所叙。辛亥革命以后，他为革命尽力仍然“几不知劳瘁……壮志未衰”，但不欲官。对蒋政府，他当然不仅不肯去为官，而且还要不断痛斥了。直至临终，他还留下“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文章何处求真尝，鸛鵒娇不自惭”之句，满

怀对革命知己的思念和渴求，对国民党当权者的抨击。他在回顾一生时，自谓“革命四十年”，显是可信的。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陈去病列为33位辛亥革命时期风云人物之一，位居第20，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

\*

\*

\*

百年南社（二十五）高天梅与南社 - 徐国昌

(2009-08-30 09:00:26)[[编辑](#)][[删除](#)]

先外祖高公天梅名旭(1877-1925)，系近代革命诗坛巨子，在晚清光宣年间，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毅然以“椽笔扶大厦，矢志建新邦”的英雄气概，反对“吟花弄鸟啼蟋蟀”的无聊诗文，提倡“我说为文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新诗得意挟风雷”，为“诗坛清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的主张清扫道路，从而奏响了让文学“作为海内文学革命之导师”的乐章。

天梅公以心灵深处积淀着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大量风格豪迈，笔力纵横的爱国主义诗作，在晚清诗坛上结出了一束束辉煌绚丽的奇葩。这些瑰丽花丛，顿时化作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利剑，直刺清朝凶残统治者的心脏。直到如今，国门内外，若美洲纽约华文报刊、香港诸多报章杂志以及台湾省所出版的各种诗话诗刊，对高天梅的诗作，率皆奖赞有加，推崇备至：“慷慨雄放，意气风发”，“允为同盟会革命诗人之首席”。（台湾《诗潮》第三集第88页编者评论）。天梅公生前所撰诗词集录留存者达二千余首，峥嵘之笔，卓尔不群。如狮吼、若虎啸、类龙吟。他的苦心孤诣，在重要的历史时刻，起到了振聋发聩，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积极效果。

天梅公的诗作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见诸上海各报刊。《读谭壮飞先生传感赋》“砍头便砍头，男儿保国休。无魂人尽死，有血我须流。”这是诗人读了梁启超所作《谭嗣同传》后为谭嗣同不屈的精神和高风亮节所激动而写的充满爱国激情的绝句。这首语言洗练、感情激越高亢的诗句，虽只寥寥二十字，诗人为国家兴盛誓必流血奋斗的爱国精神已是一览无遗。1903年8月23日《民国日报》所载：剑公《海上大风潮起放歌》：“俎上之肉终啖尽，日掀骇浪飞惊涛，两重奴隶苦复苦，恨不灭此而食朝！扬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之屠寒发毛，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堂堂大汉干净土，不许异种汗腥臊。还我河山日再中，犁庭扫穴倾其巢。做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挑战异类决雌雄，万年福祉庆同胞，冬冬法鼓震东海，横跨中原昆仑高！”这首诗当时是因《苏报》案而对章太炎、邹容的歌颂和声援，指斥清庭出卖主权，号召人民奋起与异类决一雌雄，创造一个崭新世界。全诗长达八十二句，口诛笔伐，力敌万钧。读之感人奋起，令人热血沸腾，使更多有志青年，沐浴在反清的强烈气氛中，他那种不惜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仁者之勇，能不使人肃然钦敬。

天梅公对民主自由无限向往，思盼美好社会早日到来，于1904年1月2日在《政艺通报》上发表诗作：

昨夜有好梦，疑假复疑真。梦入一乐国，景色焕然新。山水绝清妙，草木露精神。原隰相连接，秩然如萃鳞。行行村市间，仿若画中人。目不睹斗争，耳不闻慨呻。共此大欢喜，吉日以良辰。游戏公家园，跳舞自由身。一切悉平等，无富亦无贫。乐国在何许，思之泪沾巾。

在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之知理学说》宣称与“共和”诀别时，天梅公立即在《警钟日报》上（1904年4月14日）发表诗作，目标明确地表示“醉倒共和”，与之针锋相对：

《汉剑<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提诗三章，即以寄赠>》

努力重重失主权，从今先洗旧腥膻。复仇本以建新国，理论何曾不健全？意识原难尽相同，夕阳西下水流东。方针指定求前达，航海他年孰奏功？新相知乐敢嫌尽，醉倒共和却未知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

1904年8月20日高公继续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大汉纪念歌》、《逐满歌》、《光复歌》等通俗歌谣。向民众宣传共和，号召民众“鞭策睡狮起”。

“文学在高旭手里确可掀风造雷，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这是今日学者对他的革命文学的美好评价。

高天梅早在1901年就有《唤国魂》一诗发表于《清议报》，翌年，受梁启超“诗界革命”影响，作了《忧群》、《事存》、《不肖》、《俄皇彼得》、《爱祖国歌》等诗篇，体现了他对“诗界革命”的看法和坚持的方向。其间又做了“以我为诗，不以诗缚我”的论述。当年他称赞邹容入狱“宁为自由死，不作牛马生。”并声言要“仗义逐胡虏，正气壮山川”。“笔舌哭过汗马劳，伟人姓名全球标”。“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并猛烈抨击清政府的卖国媚外丑行。号召“淋漓血灌自由苗”要不惜牺牲，浴血搏杀。在《爱祖国歌》词中声称“锦潮一定会来到，祖国一定要与欧美并驾齐驱。

高天梅目睹内忧外患不断加亟，切齿痛恨满清政府专制腐败与丧权辱国，矢志“反清攘夷”推翻帝制，力求祖国强盛，建立民主新邦。为了进一步推动革命，他与其叔高燮（志攘、黄天），高增叔侄三人在金山张堰创立了“觉民社”，并出版《觉民》月刊（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1996年刊印了《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其中心思想为启发国民觉悟，宣传爱国主义，剖析局势，号召救亡揭露清政府腐败，反对列强侵略，要求改造社会，谋求中国独立富强。《觉民》在发刊词中说：“试游于欧美之乡，吸自由之空气，撞独立之警钟，吊华盛顿克林威尔与主玛志尼加富尔诸英雄，莫不豪兴勃勃。又试游于印埃之故墟，则但见恒河之滔滔，雪山之高耸，以及尼罗河、金字塔之空存，则不禁索性思返，发《黍离》《麦秀》之悲。”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扩张和清政府卖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揭示出来，警醒国人。《觉民》月刊创刊于1903年，撰稿人除了高氏叔侄三人外，其他都是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文化界精英。如顾灵石、郁脱羈、黄节、陈家鼎、包天笑、马君武、马一浮、高君平、刘师培……等人。觉民社的建立，实则是当年革命行动的先导，为创建南社，推动革命作出了组织人才的准备。

1904年高天梅出入《警钟日报》与陈去病、刘诗培、林白水等人订交，以“汉剑”笔名连续发表反清革命诗歌，他针对梁启超君主共和谬论，呼号“洗旧腥膻”“建新国”。《中国八大奴隶歌》称康、梁为第七第八号奴隶，讥之为“进退失据空彷徨”亟力反对君主共和，提出一定要彻底革命。

高天梅为了寻找革命真理联合革命志士旋即离家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初与宋教仁订交，成为革命密友，是年创刊了《醒狮》杂志以促进国势之变化（封面狮吼图由李叔同设计绘制）。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出刊前，《醒狮》被认为是最具有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一本刊物。1905年7月份孙中山先生由欧洲抵日本，高天梅参与了和黄兴等人的会见，筹组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中第一位上海籍会员，8月份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时被推为江苏省主盟人。（其时上海分会已并入江苏）当年12月中国留学生以反对日本政府文部省《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罢学归国，高天梅受命任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当年怀着一枚“孙文”印章回抵上海。他先参与组织中国公学，后另行创立健行公学以吸收有志青年，鼓吹革命。在健行公学后面夏听渠住宅中建立同盟会秘密机关，经常举行江苏省和上海地区同盟会会员秘密会议。榜其门为“夏寓”以作掩护。当时健行公学成为上海革命活动中心，革命同志皆行止于此，故有第二爱国学社之称。柳亚卢（亚子）入健行公学任国文教员，高以主盟人身份介绍其入同盟会，并共同主办革命刊物《复报》，由高拖请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田桐在东京印刷，寄回上海发行，成为中国同盟会《民报》的侧翼宣传报，该报大声疾呼，挥泪泣血以鼓吹革命，被视为国内出版物之最强音。高天梅积极发展组织，1906年1、2月份即以主盟人身份介绍吴涛、朱铁侠、朱梁任、夏听渠、庄正贵、钱醒之等加入同盟会。是年7月20日孙中山先生由日本赴南洋，船泊黄浦江，召高天梅至轮上会见，高与朱少屏、陈陶遗、柳亚卢共赴，对革命事宜有所策划。评者以为高天梅既是革命宣传家，又是个革命实干家。

高天梅在革命事业中与中国公学之马君武、傅君剑，湘学社之宁调元、陈汉元，蠡城学社之秋瑾，陈伯平等建立了革命联络，往来日趋密切。其时上海革命活动出现了一个高潮，中心就是健行公学。是年末因革命党人杨卓林被捕，“同案犯”供出上海健行公学为革命机关，主持人高天梅是革命党，高被指名查捕。“夏寓”被迫关闭。在此期间，为了激励民心，天梅公托名石达开，创作了《石达开遗诗》《哭天王被难》等诗歌二十首，一时洛阳纸贵，起到了振聋发聩将革命车轮迅速推向前进的历史作用。当时有一大批爱国主义人士，一大批热血青年受到这些诗句的激励，抛头颅，洒热血，踊跃投身于革命行列。《石达开遗诗》被视为与《正气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明末遗民录》、《清秘史》并列的珍贵遗作。论者谓这些充满革命家豪情的革命史诗，能把人带到当时斗争环境中去，无论在当年还是后来都是不多见的，高旭是南社的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阿英同志评《石达开遗诗》是辛亥革命以来最杰出的一部诗集。

据现代学者郭长海君研究，高天梅在留学日本时写的《学术改革之概论》纵览四千年中国历史、哲学、文化与思想的分化、演进，特别是对外来思想的接纳与融合，都有很透辟的论述。不仅观点正确，而且充满了辩证法。又高天梅在《致周仲穆书》（五）和姚鹓雏《〈论孔学书〉》提出孔子为“尊君之人”，比“五·四”“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要早五六年，应该引起今日学术界之注意。

“夏寓”关闭，天梅只得返回家居。虽曰家居，实质上是同盟会江苏分会作了战略转移。那年高氏在家乡金山张堰东南隅飞龙桥畔的万梅花庐刚好落成，万梅花庐一水回环，隔岸即是广袤田畴，一批革命志士相继穿梭，往来策划，比之上海市内反而安妥得多，对革命行动反较有利。天梅公在战斗阵地转移后，革命工作毫不懈怠，他仍不断执笔投枪，激情不减。健行公学虽被迫停办，他在张堰镇上又办起了一所留溪钦明女校，提倡女权，引导女性迈向社会，投入革命。其壮志可从开学典礼歌词中得到充分体现：

光明开朗，女权一线有希望。

批茶释奴，罗兰救国，取著好榜样。

前途珍重，自珍自治，幸福无量。

黄龙旗下，皆大欢喜，拍手鼓掌。

祝他日，国花异采腾千丈。

钦明女校业绩卓著，时至今日，仍为家乡父老乡亲所津津乐道。

1907年4月高天梅结集了陈去病、刘季平、沈道非、朱少屏同访苏州张东阳祠，8月天梅又与陈、刘、朱以及邓实、黄节、柳亚子……等18人结为神交社，此为南社成立之先声。1908年1月高天梅又与陈去病、柳亚子、沈道非、刘诗培集会，高在《〈次佩忍无畏韵〉》中有“尽教黄种遭奇劫，端为苍生赋大哀”句，表示要拯救民族危机，必须奋力用笔作战。3月7日上海《〈神州日报〉》刊出了高天梅题为《〈丁未12月9日国光雅集写真题两绝句〉》诗云：

伤心几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二百年。

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

余子文章成画饼，习斋学派断堪师。

荒江岁暮犹相见，衰柳残阳又一时。

全诗表达了国人要以后人超前人的毅力继承几社、复社传统再须努力前进。稍后高天梅将以前的5人集会扩展为11人，那时南社的名字已经定了下来。

2001年10月在金山参加《〈辛亥革命与南社〉》会议的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专家，都去瞻仰了万梅花庐故地，可惜原貌已经全失，现在只留下了高天梅手植的两株桂花，虽然树龄已有150年，正值花发，金光灿灿，香溢晴空。当时建筑，荡然无存，所幸前墙及“万梅花庐”门额尚在，同仁竞相摄影，以志留念。

1909年陈陶遗出狱，会同柳亚子到张堰万梅花庐访见高天梅三人相见，痛饮三日，无日不酒，无日不诗，相与拍板南社成立的一应准备工作，约定由高撰宣言定宗旨；柳亚子写社例定社事；陈去病拟启事以资召集，此次万梅花庐的三人相会，就建立南社落实了所有具体事宜、南社呼之欲出了。

1909年10月17日高天梅的《〈南社启〉》在上海《〈民吁报〉》上发表，呼唤国魂归来，扑满复汉，跃然在目。南社终于在11月13日沿着前年高天梅等5人吴门之游的路线，出阊门、买舟山塘，过五人墓，上虎丘，止于张东阳祠正式成立。其时高天梅的行动已被清庭严密监视，为顾及集会安全，他不得不避开南社成立大会，而抱憾未能出席。朱剑芒《〈我所知道的南社〉》中说“1909年南社在虎丘成立，他虽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但在当时他的声名确比去病亚子为大，为了避免清政府侦伺，就使他不能参加。”

南社的建立为“通过文学来开民智、救民德、换民心、振民气”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南社当年凝聚了一心一德的各界精英罗括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多达一千多人，主要人物都是同盟会会员，为辅翼辛亥革命，起到了举足轻重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各种报刊发行之多，执全国之牛耳，笔政率多由南社社员主持，所有报刊杂志，无不成为南社的统一局面，后来人们惊叹“今日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乃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的文治。”陈英士亦是南社社员，黄克强、姚雨平等叱咤风云人物，亦皆藉隶南社。南京政府成立后一个时期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由南社社员充任。柳亚子有句称扬语：“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

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阵而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阵而断头沥血者不乏其人，为求得民族生存而反清、反袁、反蒋、抗日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南社烈士。

高天梅写诗，力主通俗创新，反对泥古，他认为“中国旧时所称的诗人，乃狭义的诗人，而非广义的诗人，若西国，则布龙（拜伦）、苏克斯比（莎士比亚），弥尔登诸人，称之为世界大诗人者，非专指五、七言之韵语而言，凡一切有韵之文，传奇、脚本之类，皆包括在内，余谓如此尽其诗量。”又谓：“诗以明志，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不在文字间也。”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诗选、辞书对高天梅爱国主义的作品，持肯定态度。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侠士行》、《盼捷》、《元旦》、《爱祖国歌》、《自题未济庐诗集》……等达十首。前介语说“高旭的创作与他的革命活动紧密联系着，他称自己的诗是‘觉世书’，想用它，‘激起黄民热血濡’。……高诗有两种风格，抒发壮志，鼓吹革命的诗，抒情、说理交融一体，气势澎湃，富有鼓动性；慨叹革命的挫折和祖国的危亡的诗，则沉郁悲凉，感伤气氛很浓。屈原、杜甫、龚自珍对他的影响较大。”诗选前言中还说：“陈去病，奔走走北，从事革命活动。诗亦悲歌慷慨，表现了革命的激情。但他受旧格律的束缚较深，缺乏蓬勃的生动形象。高旭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比较充份，思想解放的多。他特别愤慨正统诗坛的‘伪朝伪社’和‘吟花弄月’的腐朽作风。他能够吸取新潮流的洪波，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革命。这在南社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诗潮热情奔放，表现了对革命的迫切希望。”

高天梅作了不少通俗诗歌，冲破了正統的旧诗格律，论者以为高诗长短句变化多端，短句只二、三言，而长句竟达23言，交杂错综，句式篇式均极奇特，实可称之为新诗之先驱。陈玉刚著《中国文学通史》把高旭的诗特列入“现代文学”章而不列入“清代文学”章。自亦有其一定道理。

1993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编，由文汇出版社发行了一册《爱国诗选100首》作为爱国主义教材。宣传部长金炳华以“爱国主义永远是我们强大的精神支柱”为题作序。序言中说：“该诗选注入了从《诗经》到近代几十位爱国诗人的爱国诗篇，足以代表历代诗文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的源流。读后使人深感五千年文明实赖爱国主义精神为其支柱。”高旭的《爱祖国歌》入选，编者称：“该诗作于光绪28年（1903），当时正值戊戌政变后不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掀起之时，作者采用楚辞的句式和通俗歌词的创作方法，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愿为创造祖国美好前途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本诗意境宏阔，气势磅礴，情意深沉，文笔晓畅。富有爱国激情。”



1999年3月20日台湾《世界论坛报》刊载一篇题为《清末革命文学的主要诗人——高旭》。谓：“天梅诗慷慨雄放，善作长篇古风，意气豪迈，句法奇特，有强烈的革命气概，又多有新意，其所存最晚作于1919年，但其最重要的最好的都作于1903年至1911年间，最著名的代表作如《海上大风潮起放歌》、《路亡国亡歌》等均为长篇巨裂，有吞吐风云之概，而形成极参差变化之能事，读之令人血气翻腾，实允为辛亥革命诗之首席。称他为“在文学史上掀起了全国性革命文学风潮而形成在新文学兴起前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后高峰的主要代表人。”

天梅公以身许国，百折不挠，挥泪泣雪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他的不朽著作，由其弟高基编成《天梅遗集》16集，选诗一千二百余首，于1934年刊成。为木刻线装本，可惜沧桑几易，今已稀有，即有人入藏，情商复印一册，喜不自胜。

《天梅遗集》问世离高公逝世几已十年。天梅公生于1877年农历三月初五日歿于1925年农历七月初七日，时余仅二龄，其音容笑貌，从无记忆。我母告我曰：“你名过昌为外公所命赐”，盖当年毕生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可以想见一名爱国者如何对国家昌盛兴隆企盼之殷也。

当今国运昌隆，全球肃静，当年“俄熊英狮日蟒蛇”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足可告慰于前人苦苦求索者之灵。缅怀先人业绩，喜见泽惠人间，事溯从头，不胜感慨系之。

## 百年南社（二十六）柳亚子和南社 - 白坚

(2009-09-02 08:54:22)[编辑][删除]

柳亚子（1886—1958）是著名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是南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也是南社的主要代表人物。

柳亚子诞生在江南水乡吴江县北厍镇大胜村（后迁居黎里镇虎筋桥畔）的一个书香人家。原名慰高，号安如。读卢梭《民约论》后，更名人权，号亚卢，一作亚庐。慕辛弃疾的为人，兼与陈去病之名相应，再更名弃疾，又号亚子。后以亚子为统一名号。

苏州一带原是晚明东林、复社、几社的活动之所，又是著名爱国诗人、抗清志士吴易、孙兆奎、杨廷枢、顾咸正、刘曙、钱旂、陈子龙、夏完淳等诗人、志士、爱国者的战斗之地。这时候，封建末世的清王朝，正面临着风雨飘摇，豆剖瓜分的危局。西方民主学说和革命思潮正传入中国。时代的风雨波澜。江南的思想风气，前贤的英风伟迹，使柳亚子从少年时代就萌发了爱国思想，树立了革命志向。

1903年初，17岁的柳亚子经陈去病（字佩忍，号巢南，1874—1933）等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教育学会。不久，到上海进该会所主办的爱国学读书，受教于章炳麟，与邹容等为友，他的反清革命志向更加坚定了。他在《放歌》长诗中表达了反帝反封建、爱国救亡的激情：“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阍”，“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这年夏间，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革命刊物《江苏》第四期刊载他的《郑成功传》（署名“亚卢”），编者特加按语云：

“此稿由国中寄来，作者年才十六岁。内地人士民族思想之发达，于此可见一斑。”

此为柳亚子著作之最早发表者。

1904年，柳亚子在吴江同里自治学社读书，并在《江苏》、《女子世界》等刊物先后发表《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花木兰传》、《哀女界》、《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等文，竭力鼓吹革命。在《题〈夏内史集〉》五首的最后一首中，他以青年抗清英雄、爱国诗人夏完淳自期自许：

“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

我亦年华垂二九，头颅如许负英雄。”

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发起的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陈去病、高旭（字天梅，号剑公，1877—1925）、柳亚子都是早期的会员。春间，柳亚子在同里自治学社发起学生自治会，主编《自治报》，后改称《复报》，自刻，自印，每周一次。

1906年，柳亚子应高旭之请在上海健行公学任教，参加中国同盟会，又参加光复会。他继续编辑《复报》，自68期起，从周刊改为月刊，从油印改为铅印，从单张改为单行本，由高旭函托在日本的志士田桐（字梓琴，湖北蕲春人，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1879—1930）在东京印刷，寄回上海发行，后来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小卫星”。《复报》是辛亥革命前在海外印行的重要革命刊物之一，主编《复报》是柳亚子生平的重要活动之一。

《复报》，大32开本，60页左右，第1号出版于“中国开国纪元四千六百四十年四月十五日”（1906年5月8日）。现存第1—11号（可能即出至11号而止）。署名“弃疾”的《发刊辞（通俗体）》，以“列位请了，恭喜恭喜呀”开头，以通俗的口语特辟地阐明刊物的宗旨：

“自幼读了几种书报，晓得了些道理，可怜我这昂藏七尺，已做了亡国遗黎，从此以后遍觉得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大千世界，世界空空洞洞的。……那救国的手段，自然是千变万化不离其宗，这区区报纸，却也好算手段当中的一分子了。……我抱着我的良心，我靠着我的热血，不达到我的目的，便万死也不休，管人家说我疯不疯呢！……我们这复报虽然没有甚么好东西贡献给列位，但自问宗旨是不错的。倘然能够好好办下去，也可以在二十世纪中华报界的舞台上独树一帜，做诸烈士的后劲，怎敢妄自菲薄呢！”

《复报》的宗旨无他，即反清救国，即光复中华。从“社说”、“演坛”、“哲理”、“政法”、“历史”、“传记”、“批评”，到“文苑”（后改“诗藪”）、“小说”、“谭丛”、“歌谣”、“杂著”，所有栏目的内容，无不贯串着反清救国这一总纲，大声疾呼以唤醒睡梦，挥泪泣血以鼓吹革命。

《复报》上先后发表的柳亚子著作，有《立宪问题》、《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吴日生传略》、《夏内史传略》（以上署名“弃疾”）、《中国灭亡小史》（署名“中国少年之少年”）、《云间张女士传》（署名“焉是”）等论著和大量的诗篇。署名“师南”的《神州种族厄论》、《吴烈妇传》、《明季气节列传（赵雪华、宋蕙湘传）》，署名“怀姜”的《立宪驳议》，从观点、语言、题材看，也近似柳作，尚待进一步考究。第3号所附《复报社招股细则》，以红纸印成，文颇典雅，中云：

“神州陆沈，天地昏霾，长夜漫漫，鷄旦不明耗矣。哀哉，中国之现象也。不有晨钟，畴醒睡梦！不有言论。畴张民气！此非吾修之责而谁之责耶！”

第4号所附《社告》，以绿色纸印成，中云：

“本社同人痛祖国之已亡，愤异族之无状，爰于去岁孟夏组织斯报，发扬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为国民之霜钟，作魔王之露檄。”作法，文风均与南社时期的柳氏相合无间，因而，此类短篇亦当视为他的佚文。

如果说柳亚子主编的《复报》是《南社丛刻》的前驱，那么也可以说陈去病发起的神交社是南社的前身，

1907年7月29日，陈去病在《神州日报》上刊出《神交社雅集小启》，以继承复社、几社相号召；8月15日，在上海愚园举行神州社雅集。高旭和柳亚子虽未获与会，都表示热烈支持。高旭寄诗代简，有“弹箏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之句。柳亚子根据雅集图景撰为《神交社雅集图记》，缅怀“复社隼流”及抗清英烈，号召同辈乘时奋起：

“板荡以来，文武道丧，社学悬禁，士气日燬，百六之运，相寻未已，岁寒松柏，微吾徒其谁与归！”

同年冬，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决定建立革命文学团体（以当时地位言，首倡者当为陈，然从陈后来的诗句看，又似高曾倡议者），得到在座的刘师培夫妇、邓实、黄节、朱少屏、沈砺等的赞同。据柳亚子后来回忆，“南社”的名称就开始于此时。

进入1908年，南社的筹备工作在抓紧进行，“南社”一词也先后见诸文字。2月，陈去病、徐自华等会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畔后，陈去病为徐自华《题忏慧诗集》，有“为约同人扫南社，替君传布廿年诗”之句。稍后，柳亚子有《海上题南社雅集写真》二首绝句。5月，陈去病在《有怀刘三、钝剑、安如并苦念西狩、无畏》诗中，述及高旭时又有“报仇志不遂，往往多哀呻；要我结南社，谓可张一军”之句。

1909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高旭所撰《南社启》，作为南社章程的《南社例》，宁调元所撰《南社序》，陈去病所撰《南社诗文词选序》和《南社雅集小启》，先后在《民吁日报》上发表。11月13日，南社第一次雅集在苏州虎丘张公（国维）祠举行。“这晚清文坛上的怪物”，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就正式成立了。

南社的三个发起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南社第一次雅集参加者十七人中的十四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因此，南社实为受中国同盟会思想影响的革命文学团体，说它是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成，也未为不可。

尽管当时见于报章的南社文献，态度或不免隐晦，语气或有所含蓄，其反对清朝统治，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意旨，还是不难领会的。《南社启》对南社的命名虽故为隐晦，说明“‘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但以“国魂”为号召，提出：

“夫人莫哀于亡国，若一任国魂之漂荡失所，奚其可哉！”

《南社雅集小启》虽用“逸韵”、“文采”之类词汇冲淡南社的政治色彩，但以“生机”相祝愿，表示：

“芙蓉弄妍，岭梅吐萼，微乎，彼南枝乎，殆生机其来复乎！”

真义所在，明眼自可心领神会。而《南社序》则用春秋楚国爱国志士钟仪事，谓“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无所顾忌地点明南社的反清宗旨。1912年，陈去病始在《南社长沙雅集记事》中明确指出“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

南社成立时，柳亚子才二十二岁，意气风发，勇于任事。他以梁山泊上的及时雨宋江喻陈去病，而以小旋风柴进自命，在会前会间，奔走筹划，不遗余力，会后有诗以纪云：

“寂寞湖山歌舞尽，无端豪俊又重来。天边鸿雁联群至，篱角芙蓉晚艳开。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

这次雅集选出的《南社丛刻》（简称《南社》）的编辑员和职员是：文选编辑员陈去病，诗选编辑员高旭，词选编辑员庞檠子，书记员柳亚子，会计员朱少屏。

陈去病、高旭都富于书生气，不善任事，作风马虎，高所编《南社》第一集，陈所编《南社》第二集，体例都不严谨，引起柳亚子不满。第三次雅集改选出的编辑员都未任事，因而四、五、六、七各集，实际上都由柳亚子主持选政。

民国纪元前《南社》出版了四集，刊载了不少揭露清朝统治、表彰前代英烈、鼓吹革命斗争的诗文。如《南社》第4集出版于1911年6月26日（辛亥六月朔日），8月5日，《民立报》载文评介云：

“《南社》第四集，南社编。南社创于海上已数年，社员多当代名士，盖仿以文会友之意。四集辑录社员所撰著，都计文34首，诗371首，词124首。其间感慨淋漓，可诵之篇不鲜也。”

8月12日,《天铎报》载李怀霜《艺文月旦》云:

“所刊第四集,首骈散文,次诗,次诗余,所诣皆雅正道上。复多折衷新理,有关社会向导之作。……谓之近时名著,夫复何疑!”

翻阅此集中“诗录”,首列山阳周实的《痛哭四章》,显然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而作,其一、四章云:

“腥风血雨误归期,痛哭江头杜拾遗。弩末已无穿縠力,刀头休作赐环思。狰狞猛虎磨牙日,夭矫神龙见首时。虏运将衰炎运在,南阳会睹汉旌旗!”

“直将刍狗视人群,无限苍凉日暮云。壮志未酬填海鸟,痴心枉作负山蚊。荒烟孤岛田横客,夜月悲笳翟义军。猿鹤沙田同一烬,累累七十二荒坟。”

沈痛悼念起义殉难的烈士,热烈企盼和召唤四方志士奋起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清朝统治,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出版物的革命最强音了。

1912年元旦,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柳亚子应南社社员雷昭性之荐,赴京任总统府秘书,寻因病辞职返沪。对当时南北和议及孙文让位于袁世凯的妥协主张,柳亚子坚决反对,在《天铎报》上,他以“青兕”笔名间日撰社论强烈抨击。《南社》第5集所载柳亚子撰《追悼会祭周阮二烈士文》更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愤慨:

“况又议和误国,荡虏无人,北庭小丑,尚婴僭窃之尊;南都政府,复有迁徙之议。降幡一片,行见重出于石头;铸错六州,终已不逢夫干莫。……呜呼,沧海横流,神州陆沈,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猿鹤沙虫,同归于尽。吾侪方祈死之不暇,又岂徒为烈士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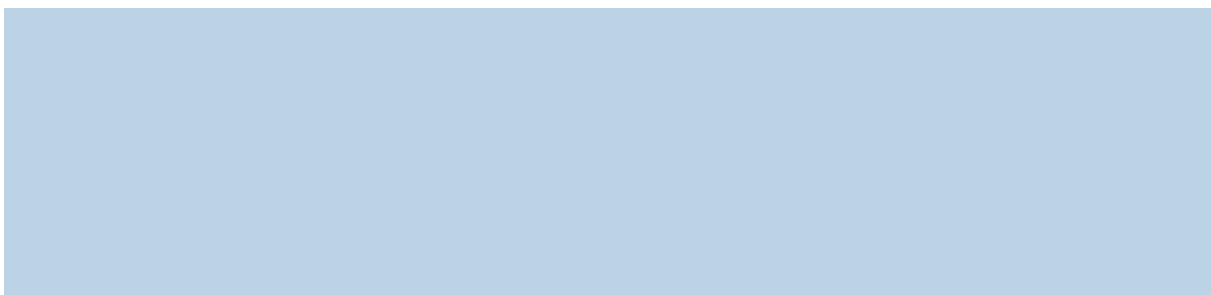
南社从成立到停止活动,历时十五年,参加者一千余人,其中不少人革命意志薄弱,未能与时俱进,转向保守,有些甚至蜕变为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堕落为官僚、卫道者、卖身投靠者、汉奸、卖国贼,也不乏慕名而来,随流涌进的官僚、政客和浮薄文人。

在反清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南社在文字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南社革命文学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作为革命文学团体的组织者,柳亚子以苦干实干的精神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大部时期内,南社社务的主持者,南社活动的中心人物,是他;《南社丛刻》二十二集的大部份的编辑、校印者,也是他;南社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坚持者,更应当首先数到他。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南社的代表人物。

作为爱国主义的诗人,柳亚子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写下了许多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鼓吹抗暴救亡的篇章。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为争取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他的《磨剑室诗词集》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为广大读者所珍爱。

1987年5月28日,在纪念柳亚子诞生100周年的时刻,柳亚子纪念馆在苏州市吴江县黎里镇他的故居举行揭幕仪式。笔者应邀躬逢其盛,口占一绝云:“南社歌吟功自在,分湖遗响至今雄。承先启后吴江柳,文采风流一世宗。”借用柳亚子早年赞颂明末爱国诗人、抗清英雄夏完淳的诗句来概括他的生平,看来是恰当的。倘使他地下有知,该会引以为快吧!



## 百年南社（三十一）祝贺南社后裔高锟获得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蔡恒胜

(2009-10-07 02:15:49)[编辑][删除]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6日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英国华裔科学家高锟以及两位美国科学家。高锟获奖，是因为他在“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做出了突破性成就。

高锟被誉为“光纤之父”。早在1966年，高锟就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用玻璃纤维作为光波导用于通讯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提出以玻璃制造比头发丝更细的光纤，取代铜导线作为长距离的通讯线路。这个理论引起了世界通信技术的一次革命。随着第一个光纤系统于1981年成功问世，高锟“光纤之父”美誉传遍世界。

高锟还开发了实现光纤通讯所需的辅助性子系统。他在单模纤维的构造、纤维的强度和耐久性、纤维连接器和耦合器以及扩散均衡特性等多个领域都作了大量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使信号在无放大的条件下，以每秒亿兆位元传送至距离以万米为单位的成功关键。

高锟1933年在上海出生。1949年随家前往香港。195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并于1957年及1965年获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从1957年开始，高锟即从事光导纤维在通讯领域运用的研究。1987年10月，高锟从英国回到香港，并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从1987年到1996年任职期间，他为中文大学罗致了大批人才，使中大的学术结构和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在与内地科技界的交流合作中，他主张“一步一步把双方的联系实际化”。

高锟1992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数理组院士。他曾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也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高锟于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于1981年12月3日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3”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

高锟的祖籍是上海金山，他的祖父高吹万、父亲高君湘都是南社前辈。这是这位南社后裔和高氏家族的荣光。也是海内外中国人的骄傲。这也是南社即将迎来100周年纪念日之前的大好消息。让我们热烈祝贺高锟获得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百年南社（三十二）《陈去病全集》序言 - 杨天石

(2009-10-22 09:53:20)[编辑][删除]

《陈去病全集》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在南社百周年之前是一桩大事。杨天石先生为此书撰写了序言特转载如下，此为初稿，正式稿以出版为准。

### 《陈去病全集》序言（初稿）

杨天石

#### 一

陈去病，原名庆林，字佩忍，又字巢南、病倩，别号垂虹亭长。笔名有季子、醒狮、大哀、南史氏、有洸血胤、东阳令史子孙等。江苏吴江同里镇人。1874年（同治十三年）生，为遗腹子。1903年在日本加入拒俄义勇队。1906年加入同盟会，自此长期追随孙中山，投入民主革命，1909年发起并组织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13年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任江苏讨袁军司令部秘书。1918年赴粤，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维护民主共和的“护法运动”，先后担任非常国会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等职。1922年，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陈去病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不久，陈炯明兵变，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陈去病经孙同意，到南京任东南大学讲师，教授中国文学及诗歌、辞赋。1924年任江苏临时省党部委员，在上海组织江苏民治建设会。同年随孙中山北上，任清理清宫古物委员。次年，孙中山逝世，任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1925年，被选为江苏省党部临时监察委员。1928年，任古物保管委员会苏州分会主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1933年，在苏州报恩寺受比丘戒。同年10月4日逝世。

陈去病是民国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新闻家、诗人、教育家和学者。

#### 二

纵观陈去病一生，有六大贡献。

一、献身民族民主革命，推动青年知识分子转化。

陈去病七岁入塾，攻读四书五经，二十二岁考中秀才，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但是，忧患丛生的时局改变了陈去病的人生道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1898年，维新运动兴起，陈去病即在家乡同里组织雪耻学会响应。1902年，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以爱国和革新为主旨的中国教育会，陈去病即组织同里支部。这时候，陈去病还处在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影响之下。但是，1903年陈去病赴日留学之后，却迅速从爱国走向革命。当年4月，传说广西巡抚向法国出卖权益，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掀起拒法运动。陈去病致书同里教育会，引证西汉名将霍去



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名言激励众人，自此便以去病为名。同月，沙俄拒不按约撤退在我国东北的军队，东京中国留学生再次掀起拒俄运动。在黄兴等发起倡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奔赴疆场，为国效命时，陈去病毅然签名，被编入丙三分队。清政府害怕学生，加以阻挠、镇压，激起学生愤怒，纷纷转向反清。同年6月，陈去病在同乡会杂志《江苏》第3、第4期发表题图长诗，歌颂朱元璋灭元兴明和郑成功抗清的英雄事迹。又发表长文《革命其可免乎》，批判清政府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认为长此以往，中国必将瓜分豆剖，万劫不复。文章呼吁：“革命乎！革命乎！其诸海内外英材杰士，有辍耕陇畔而恍然太息者乎，则予将仗剑从之矣。”拒俄运动的受挫促使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向革命转化。陈去病是这种转化的典型的代表，也是带头人。自此，陈去病即追随孙中山，投身民族民主革命。旧说认为陈去病是“一民主义者”，衡以陈在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参加“护法”诸役，说明此说不确。

## 二、发起并组织多个革命社团，主盟南社。

明代中叶以后，吴江地区文社发达。先有不少文人参加东林、复社。明亡后，叶继武、戴笠等吴江人士组织惊隐诗社（逃之盟），顾炎武、归庄等纷纷加盟。陈去病受先辈濡染，一生组织过多种社团。1906年，陈去病到徽州府中学堂任教，与后来成为绘画大师的黄宾虹共事，因仰慕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学风和文风，共同组织黄社，其宗旨为“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文”。1907年7月，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浙皖起义失败，秋瑾殉难。陈去病想在上海召开追悼会，被人所阻，便于8月15日（夏历七月七日）邀集吴梅、刘三、冯绍清等11人组织神交社，计划出版《神交集》，未成。1908年初，陈去病在上海与刘师培、高旭、柳亚子等计议组织文社，继承明末幾社、复社传统。2月25日，陈去病和徐自华在杭州为秋瑾下葬，并在凤林寺举行追悼会，组织秋社。事后，陈去病应邀赴绍兴府中学堂任教，通过学生宋琳，组织匡社，以匡复中华为志。1909年8月，陈去病到苏州张家授馆，继续酝酿结社。10月17日，陈去病在《民吁报》刊登《南社诗文词选序》，提倡“不得已”之作，或如贾谊“江南愁叹”，或如谢翱“西台痛哭”，都是在国家危殆、社稷沧桑时由衷发出的悲凉慷慨之音。考虑到本文是公开发表之作，陈去病没有将反清的目的写得很显豁，但是，字里行间，人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他的意旨。11月6日，陈去病在《民吁报》上刊出《南社雅集小启》，公开宣布召开成立会的日期和地点。《小启》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严冬统治下春意的萌动“芙蓉弄妍，岭梅吐萼。微乎微乎，彼南枝乎，殆生机其来复乎？”11月13日，南社成立会在明末复社文人的活动地点苏州虎丘召开。陈去病、柳亚子等十七人到会。在近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遂呱呱堕地。1910年春，陈去病到杭州任教于浙江高等学堂，在原匡社的基础上组织越社。鲁迅、范爱农等均成为社员。在《越社序》中，陈去病号召革命党人力挽狂澜，挽救危难中的祖国。他说：“惟夫君子禀百折不回之志，婴至艰极巨之任，毅然决然而无所恐怖，于是经历险阻，备诸困厄，而泰乎如履坦夷之途，斯其所由回劫运而貽衽席也，孰谓天定胜人而人不可以胜天哉，盖亦视乎人而已矣。”

## 三、创办、编辑多种革命报刊。

1903年夏，陈去病回到上海，初任爱国女学教师。1904年，应蔡元培之邀，出任《警钟日报》编辑。这是继《苏报》之后上海又一份著名的革命报纸。1907年，陈去病南下汕头，参加《中华新报》编辑，“盛倡民族主义”，使之成为革命党人在岭南的重要宣传阵地。1910年，同盟会中部总会上海创办《中国公报》，陈去病为主要撰稿人，1911年6月，陈去病自杭州返苏，创办《苏苏报》。武昌起义，苏州独立，陈去病应江苏都督程德全之邀，创办《大汉报》，宣称该报将“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族之成，并提倡民生主义，以亟图社会之升平，获共和之幸福。”此后，他为报纸写作了一系列文字，反对和袁世凯妥协，主张北伐。12月21日，《大汉报》停刊。同月，鲁迅等越社同人在绍兴筹办《越铎日报》。1912年1月，陈去病与人在上海发起创办《黄报》。同月，赴绍兴任《越铎日报》总编辑。6月，改任杭州《平民日报》总编辑。总计，陈去病一生参与



编辑、出版的报纸约8种之多，在其他革命党人的报纸，如《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天铎报》、《大风日报》、《民国日报》，《民信日报》，以至《长沙日报》等处，都发表了大量作品。陈去病参与创办、编辑或撰稿的刊物则有《江苏》、《复报》、《国粹学报》、《江苏革命博物馆馆刊》等多种。他是辛亥前后的重要革命新闻家。

#### 四、发幽阐隐，借历史鼓吹反清革命。

明末，清兵入关之后，曾在扬州、嘉定等地实行残酷、野蛮的屠杀，而江南人民则以各种形式反抗，涌现出无数抗清志士。1903年陈去病自日本归国之初，即辑录《建州女直考》、《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忠文靖节编》等书，加上鼓动性的批语，编为《陆沉丛书》出版，用以激发汉族人民对满洲贵族的仇恨。同年，陈去病编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文章为《正气集》。此后，陈去病即以大量精力收集和整理江南抗清志士的遗文和著作。1645年，吴江人吴易以太湖为根据地起兵抗清，几次大败清兵。次年被捕，在杭州草桥门被凌迟处死。陈去病将他的遗稿整理成书，定名为《吴长兴伯遗集》。另一位吴江人士吴炎，明亡后遁迹湖州山中，参加惊隐诗社。1663年，受庄廷鑑明史案牵连，在杭州弼教坊被清政府凌迟。陈去病也将他的作品整理成书，定名为《吴赤溟先生遗集》。1906年陈去病在徽州府中学堂任教期间，编辑完成《烦恼丝》、《五石脂》二书。前者叙述清初汉族人民抗拒剃发蓄辫的史实，后者叙述东南志士的抗清逸事，兼录诗文。1907年春，陈去病到上海主持国学保存会，参与编辑《国粹学报》。期间，广泛收罗、阅读典籍数万卷，开始编著《明遗民录》。这是一部大型传记总集。原计划很大，但实际上只完成了孙奇逢、颜元、傅山等12人的传记。陈去病编著的这些作品并不仅仅鞭笞满洲贵族，颂扬汉族节烈，其中也常有现代思想的光照。例如指斥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对于民族道德的“斲伤”，批判“中国历代之君主无不假公以济私”，痛愤“吾汉族之民，不知合群为何物”等等。

#### 五、倡导戏剧改革。

1904年夏，陈去病编辑《警钟日报》期间，结识上海京剧名演员汪笑侬。当时，汪正在演出新戏《瓜种兰因》。该剧根据《波兰衰亡史》改编，写土耳其入侵波兰，波兰战败求和，割地赔款。名为外国时史事，实际上处处影射清朝政府，紧接着，汪笑侬又演出清初名剧《桃花扇》，二百多年前孔尚任所描写的南明兴亡史引起陈去病的强烈共鸣。同年8月，陈去病在报上发表《论戏剧之有益》一文，高度肯定戏剧的宣传鼓动作用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鼓励青年革命党人深入梨园，与戏剧艺人结合，编演宣传革命思想的新剧。他特别看重戏剧易于为下层群众接受、理解的“普及”功能。文称：“举凡士农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为了进一步提倡新戏，陈去病于1904年发起出版《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该刊分图画、论著、传记、班本、小说、丛谈、诙谐、文苑、歌谣、批评、纪事等栏，实际上是一份以戏剧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杂志。其中《安乐窝》（孙毓汶著）一剧，规定以女丑扮演慈禧太后，尖锐地谴责她穷奢极欲，不管民间死活，不顾国家沦亡。当时，慈禧太后还执掌大权，正在庆祝七十寿辰。发表这样的剧本需要极大的勇气。当年11月，志士万福华谋刺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被逮，陈去病于事发后不久，即以之为素材写作剧本《金谷香》，成为迅速反映现实的时事剧。由于陈去病的积极提倡，上海出现戏剧改良会，新剧演出顿形活跃。马君武曾盛赞陈去病对戏剧的提倡：“论诗昔慕美尔顿，观戏今逢莎士比亚。怀才抱奇不自得，献身甘作优伶诗。”

在近代，最早重视戏剧的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发表《劫灰梦传奇》，后来又写作《新罗马传奇》等篇，但是，真正从理论上阐明戏剧的社会作用、艺术功能，创办杂志，并和艺人结合，切实推进其改革的，不能不首推陈去病。

由于夏曾佑、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提倡，晚清盛行“小说界革命”。风气所及，陈去病也曾于民初以浙江会党首领王金发的事迹为素材，写作小说《莽男儿》，表现出陈去病对这一种新兴文学体裁的探索。

## 六、写作了大量革命诗文。

陈去病是革命家，也是宣传家。在文章写作上，他批评六朝的浮华文风，反对形式重于内容，锦袍其外，败絮其中，也反对桐城派的“空谈义理”，“俚浅不根”，更反对分别门户，模仿古人。他重视内容，强调文从字顺，既有格调，又能使读者回肠荡气。他的文章大多为革命而作。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古色古香的传统文，一种是为普及公众而作的报刊体文。他的传统文以《神交社雅集小启》、《南社诗文词选序》等为代表，讲究文采，甚至讲究对仗，显示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其中传记文分量最大，其代表作有《鉴湖女侠秋瑾传》、《高柳两君子传》、《垂虹亭长传》以及《明遗民录》中的若干篇章。它们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细节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在努力吸收并继承司马迁的人物列传的优良传统。报刊体文以《革命其可免乎》、《论戏剧之有益》等为代表，它们接受了梁启超“新民体”的部分影响，注重通俗性和鼓动性，笔锋毫端，常常凝聚着作者的感情。他赞成时人林獬（白水）创办《中国白话报》，誉之为“肖泉通俗语能新”。不过，他认为“俚俗”仅能“启蒙”、“导迷”，神圣的文学殿堂还是需要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人的文笔。陈去病生当从维新向革命转化的时刻，一生遭逢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他的诗在工整严谨的格律中抒情言志，表述自己在革命生涯中的种种感受。这一时期，革命中的成功少而挫折、失败多，陈去病也因而欢乐少而痛苦多。因此，他的诗以慷慨悲歌，沉郁苍凉为特点，反映出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 三

陈去病一生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是诗。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宋人力破唐人余地，形成了我国诗歌的另一个高峰。自此双峰并峙，各领风骚。宋以后的诗坛，或尊唐，或尊宋。当尊唐之风大盛以至形成弊端之际，诗人们往往会转而尊宋；而当尊宋形成弊端时，诗人往往又会转而尊唐。鸦片战争前后，尊宋成为诗坛风尚，同治、光绪年间，甚至出现以学宋为主的“同光体”。南社虎丘会议期间，柳亚子曾与陈去病讨论诗歌的取法方向。两人都尊唐，成为同调。为此，柳亚子有诗云：

匆匆半月昌亭住，与汝评量诗派来。一代典型嗟已尽，百年坛坫为谁开？横流解悟苏黄罪，大雅应推陈夏才。珍重分襟无别语，加餐先覆掌中杯。

——《时流论诗夺鹜两宋，巢南都尊唐风，与余相合，写诗一章，

即用留别，并申止酒之劝，时余亦将归黎里矣》

苏黄，指宋代诗人苏轼和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二人都是有重大成就或有重要特点的大家，但是，苏轼的有些诗，喜欢逞弄才华，夸多斗靡，铺排成语典故。黄庭坚的诗，奇拗硬涩，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强调“一字无来历”，流弊所及，遂至从前人作品中撕扯拆补，以模仿改制代替创新、开拓。因此，元朝诗人元好问曾批评其流弊说：“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柳亚子同意元好问对苏、黄末流的批评，推崇“唐风”，特别推崇明末抗清英雄陈子龙和夏完淳二人的诗作。柳亚子的这首诗表明，他和陈去病在诗派的宗仰和取法上完全一致。1917年7月，南社成员中发生唐宋诗之争，柳亚子受到社中尊宋派的批评，陈去病曾寄诗柳亚子，表示支持，前有长序云：

明七子教人不读唐以后书，虽甚激切，然余颇谅其愚直焉。自后世拨西江之死灰而复燃之，由是唐音于以失坠。闽士晚出，其声益一杀而厉，至于今，蝟螭沸羹，莫可救止，而国且不国矣。柳子安如独能挥斥异己，余甚壮之，因为诗三章以寄，庶几益自勗励而勿懈其初衷乎？

陈去病这里所说的“勿懈其初衷”，指的就是南社成立、虎丘会议时的尊唐约定。柳、陈等提倡“唐音”，意在适应反清革命的需要，提倡盛唐年代诗坛的开朗宏大、热烈豪放的诗风，但是，其中显然包含政治斗争的内容。晚清同光体的代表诗人大都出仕清政府，所谓“闽士”，其代表性诗人就是郑孝胥。此人在清末出任湖南布政使，辛亥革命后成为遗老，支持张勋复辟。柳、陈等在诗歌创作上尊唐反宋，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在文学上的表现。

不过，盛唐是一个上升的时代，国力强盛，而晚清时期，中国有亡国之忧。因此，柳亚子、陈去病作诗虽尊唐，而其实际尊崇的则是明末的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张煌言等人，其诗风也与上述诸人接近。

陈去病是爱国者。其诗作反映出他对辛亥革命前夜，帝国主义侵略日益深入，民族危亡在即的忧虑，充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已经摆脱了传统文人“忠君”思想的束缚，体现出现代的新特色，即重点在于维护国家领土、民族权益和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

二十世纪初年，沙俄积极向我国东北扩张，边疆危机加重。陈去病在赴日留学，寻找救国真理之际，曾准备经朝鲜，入东北，考察沙俄侵略状况。有诗云：

长此樊笼亦可怜，誓将努力上青天。梦魂早落扶桑国，徒侣争从侠少年。宁惜毛锥拚一掷，好将剑佩历三边。由来弧矢男儿事，莫负灵鳌去着鞭。

——《将游东瀛赋以自策》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日渐强盛，吸引了大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纷纷到日本留学。陈去病写这首诗的时候，已年近三十，但是，他仍然像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渴望冲出黑室，摆脱樊笼，出门看世界，了解天下，了解强邻逼伺的状况。

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在我国的领土上爆发战争，但清政府却宣布中立这一年，陈去病自上海归同里，夜宿青浦，发现当地人懵然不觉，仍在挑灯豪赌，陈去病激愤地写道：

瀕洞鲸波起海东，辽天金鼓战西风。如何举国猖狂甚，夜夜樗蒲蜡炬红？

——《癸卯除夕别上海，甲辰元旦宿青浦，越日过淀湖归于家》

一边是枪炮轰响，战鼓震天，一边却是呼么喝六，在赌桌上争斗拼杀。诗人目睹此状，忧心如焚，发出了强烈的谴责。1908年，陈去病南游闽海，在厦门泛舟登鼓浪屿，观察到列强的船舶正在我国的海上游弋，有诗道：

西风落日晩天晴，列岛遥看战一枰。番舶正连鹅鹳阵，怒涛如振鼓鼙声。凭高独览沧溟远，斫地谁为楚汉争？海水自深山自壮，不堪重忆郑延平。

——《自厦门泛海登鼓浪屿有感》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厦门于1843年开辟为通商口岸。1902年，清政府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丹麦、荷兰、日本等9国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使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陈去病抚今追昔，不禁深深地怀念收复台湾、赶走荷兰侵略者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希望在新的时期，中国能有人出面与列强抗争。

清兵入关后，江南成为抗清基地，在长年的革命生涯中，陈去病奔走东南各地，凭吊当年英勇抗击清军以至断头沥血的先民，产生了大量诗作。如：

北伐当年事大难，伊人曾此下寒滩。者番恰称招魂祀，灯火楼船夜未阑。

——《九月初七日新安江上观水嬉，并为有明尚书苍水张作周忌》

策马高冈日色斜，昆明南望泪如麻。蜉蝣背脊今何在，只向秋原哭桂花。

——四月二十五日偕刘三谒苍水张公墓，并吊永历帝

张苍水，名煌言，曾任南明兵部尚书。他在浙东山地和沿海一带举旗抗清。曾与郑成功合兵，入长江，围南京，直进芜湖，共下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东南震动。诗人想象当年张煌言“饮血提戈”艰苦奋战的情景，回忆永历皇帝为吴三桂所俘，在昆明被绞死的往事，不禁泪下如麻。这类诗，对于熟悉明末史事的传统知识分子，自然具有特殊的激励作用。

一切革命都是艰难的，会有许多失败、挫折和牺牲。1903年，章炳麟和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因《苏报》案被捕，陈去病来到上海海滨，登楼瞭望，有诗道：

惨淡风云入九秋，海天寥廓独登楼。凄迷鸾凤同罹网，浩荡沧瀛阻远游。  
三十年华空梦幻，几行血泪付泉流。国仇私怨终难了，哭尽苍生白尽头。

——《重九歇浦示侯官林獬、仪真刘光汉》

同志被囚，革命多艰。当时，陈去病虽已进入中年，而所事无成，白发早生，自然感慨系之。“哭尽苍生白尽头”，生动地写出了陈去病心系革命，与革命同忧患的感人形象。

现实尽管严酷，陈去病却仍然对革命充满信心。1907年，陈去病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追捕，离乡南行，南行之前，他去黎里向柳亚子告别，有诗云：

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想看泪满痕。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茫茫宙合将安适，耿耿心期只尔论。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

——《访安如》

当时，秋瑾已遭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沉痛哀悼，故诗中有“多碧血”、“碎芳魂”之叹。环顾宇内，他觉得只有柳亚子是知己，因而密告其此行怀有“壮图”，实现之后，将在晴光普照之中扬鞭北返。诗中的感情是沉重的，但又是奋发昂扬的。

陈去病的诗，多写“哭”，多写“泪”，但是，这不是小儿女的两情难圆之哀，也不是旧文人的叹老嗟卑的落魄和穷愁，而是为民族、为国家、为革命的大悲、大哀，因此，这种诗，就表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境界和不同的气象。陈去病将他住宅的厅堂定名为“浩歌堂”，因之，其诗集定名为《浩歌堂诗抄》。这个“浩”字，确实准确地传达出陈去病其人，特别是其诗的特点。人们评唐诗，有“唐人气象”之说，读陈去病等南社主要作家的诗，是不是也感到有一种处于艰难竭蹶之中的革命党人的“浩然”气象呢？

辛亥革命没有建成革命党人理想中的“天国”，袁世凯登台后不断摧残民主、共和。在此情况下，陈去病没有退缩，而是感到“救世情愈切”。宋教仁被刺时，他赋诗哀悼说：

柳残花谢宛三秋，雨阁云低风憾楼。中酒恹恹人愈病，思君故故日增愁。豺狼当道生何益，洛蜀纷争死岂休！只恐中朝元气尽，极天烽火掩神州。

——《苦遁初》

本诗首二句写自然景色，实写袁世凯当权时期的政治气氛。末二句写宋教仁被刺后诗人对中国政局的忧虑。陈去病的预感是正确的。不久，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战火再起，陈去病也迅速投入反袁军的行列。

陈去病的诗，并不全写革命，但其他题材也常常体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的胸襟。如：

舵楼高唱大江东，万里苍茫一览空。海上波涛回荡极，眼前洲渚有无中。云磨雨洗天如碧，日炙风翻水泛红。唯有胥涛若银练，素车白马战秋风。

——《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

这是一首写景诗，但境界扩大，昂扬激越，仿佛汹涌澎湃的波涛也充满了战斗气息。

前人慨叹，诗已经被唐人写尽；到了清末，自然更易有写尽之感，所以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不得不提倡“诗界革命”，企图引进“新名词”、“新事物”、“新思想”，黄遵宪并以“吟到中华以外天”自诩。但是，为诗歌开拓新题材、新内容，将革命写进诗歌的则是南社诗人，陈去病是其杰出的代表。此后，白话诗逐渐登场。因之，可以说，陈去病是我国古典诗歌压轴时代的重要诗人之一。

在词风方面，柳亚子推崇辛弃疾。虎丘成立会上，朱锡梁认为“南宋词人，以稼轩为第一，余子不足道也”。柳亚子赞同此说，特别批评吴文英的《梦窗词》为“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同座的庞树柏和蔡守却特别欣赏吴文英的词风，四人间发生激烈争论。陈去病论词，在批评吴文英方

面与柳亚子一致。他认为吴词“隶事癖奥，摘词窒塞”，有如猜谜。不过，在宗主方面，陈去病推崇的是南宋以姜夔为代表的“清空”一派和近代龚自珍的《定庵词》。

陈词佳作如 1907 年凭吊虎丘张公词的《天仙子》：

短艇轻桡随处舣，又到中丞香火地。神鸦社鼓不成声，哀欲死，无生气。入门撮土为公祭。痛饮黄龙今已矣，亮节孤忠空赍志。满园花木又凋零，余碧水，向东逝（祠在绿水湾），盈盈酷似伤心泪。

张公，指明末抗清名臣张国维，浙江东阳人。以疏浚吴江一带水道得名。明亡后，他拥立鲁王，在浙江东阳等地与清军苦战，失败后穿戴衣冠，向母亲告别，投园池而死。本词吊张，借景抒情，而个人的怀抱和感慨尽在其中。

#### 四

我在拙著《南社史长编》的序言中谈过，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在某些方面比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难。其主要难点就在于资料。古代作家，大都有完备的全集，而近代作家，大都没有全集。其作品，分散于许多地区的不同报刊上，需要研究者逐一去检索、发现、辑录。近代出版业发达，发表作品容易，但是，消失也容易。不少报刊，昙花一现，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以辛亥革命时的报刊论，世界上没有任何图书馆可以自称收集完备。这可就苦了研究者了。此外，全面了解作家生平也是件难事。古代作家一般在正史或野史、笔记中都有相关记载，而近代作家呢，有完整传记的人很少。此外，近代流行笔名、化名，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可以使用多种笔名。要把一个作家的笔名收集齐全，考证准确，也并非易事。记得 1958 年我在北大上学，为《中国文学史》撰写近代文学的有关章节，后来编选并注释《近代诗选》，自然，都要收集陈去病的作品和事迹。然而，找来找去，只找到一部他的诗集《浩歌堂诗抄》。关于他的生平，只找到柳亚子《南社记略》中的部分记载。这自然不够用，不得不在辛亥前后革命党人创办的报章杂志中去广泛收罗。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我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一直在做。记得当时革命党人在中国和日本等地创办的许多杂志，我可以都看过，报纸，则是一张张翻过的。这才将陈去病的作品看得比较齐全，生平了解得比较完备了。然而，还是有若干缺憾，一些报纸找不到，一些档案没有留存下来。有一年，我到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的宿舍里去探望陈去病先生的女公子绵祥女士。承她出示去病先生手书的年表《尘网录》和《浩歌堂诗续抄》，都是我所未知的。等到我第二次拜访，想从绵祥女士处借阅时，绵祥女士已经病重，滚翻在地。记得当时还是我将她扶到床上的。绵祥女士去世后，我向绵祥女士的公子蔡恒息先生打听上述两件未刊稿的下落，他在家翻检过，告诉我找不到。我想，也许从此失落了，多可惜呀！

真是事有凑巧，2007 年 5 月，我到苏州参加柳亚子的纪念活动，见到去病先生的女婿和外孙张左一、张夷先生父子，他们告诉我，正在编辑《陈去病全集》。我很高兴，赶忙问，有无《尘网录》和《浩歌堂诗续抄》，他们说原稿都在他们手里。我的心头立刻浮上一阵惊喜，谢天谢地，终于没有失落。又过了两年，张夷先生告诉我《陈去病全集》已经编辑完成，即将出版。我从张夷先生赐示的目录看，这确是目前最完整的陈氏全集。凡目前可以找到的作品几乎都网罗无遗了。他们不仅利用了去病先生的子女陈绵祥、陈瑾、陈达力等人的家藏，还大力收集了陈去病散落在清末民初报刊上的大量诗文。这些诗文，当时于革命影响甚大，但是，正像章太炎一样，后来编文集时却弃之不

录。张夷先生告诉我，为编这部书，他跑了许多地方，这我是充分相信的。有的报刊，海内仅存孤本，不跑，哪里可能收集到！

从《陈去病全集》目录看，《浩歌堂诗抄》经陈绵祥校勘，《浩歌堂诗续抄》经柳亚子校勘，又是未刊稿，弥足珍贵。《浩歌堂诗补抄》、《巢南诗话》、《病倩词》、《病倩词话》、《巢南文集》（1——13）、《巢南集外文》（1——5）等，都是张夷先生辑录的，其工作量的巨大和艰辛，可想而知。有了这些新增的内容，陈去病的生平创作就几近完备了。有了《全集》，今后的陈去病研究、南社研究、近代文学研究就方便多了。一编在手，全豹入目，其乐何如！此外，《全集》还编入了陈去病生前辑录的乡邦文献《吴江诗录》、《笠泽词征》和《松陵文集》等书，也将大有助于吴江地方史的研究。

当然，我说这部《全集》几近完备，似乎意有保留。这是因为，陈去病曾在1913年出任江苏讨袁军司令部秘书，1922年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陈去病出任大本营前敌宣传部主任，他的那些杀敌讨贼之作，迄今尚未发现。辛亥革命前，陈去病在苏州创办的《苏苏报》，迄今也尚未发现。在汕头出版的《中华新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虽有收藏，但其中陈去病文章均被柳亚子剪存，该剪存本至今未见，这就须远赴南方找寻该报补录。《越铎日报》，这是陈去病和鲁迅联手编辑的报纸，但该报文章大多用笔名，我们无法判明哪些出自陈去病之手。这样看来，《陈去病全集》的增补还大有可为。进一步辑佚钩沉，斯有望于张左一、张夷先生父子，有望于近代史和近代文学史研究的广大学者。

2009年5月30日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百年南社（三十三）《陈去病全集》序 - 王飏

(2009-11-22 04:48:19)[编辑][删除]

原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变更登记后，经理事会与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协商，请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先生任研究会会长，我则忝居常务副会长，协助操持会务。二〇〇六年，在京召开新一届理事会预备会议，而陈去病先生之子陈达力先生因患眼疾未能莅会，未免有所憾。乃高銛（高燮先生后人）与姚昆田（姚光先生后人）两位副会长告诉我，陈去病后人中，其外孙张夷也在苏州，创办景观园艺设计企业机构，对南社研究事业非常热心。随后与张夷先生联系，始知其尊人张左一先生（陈去病女婿）在江阴文化局工作，多年来，父子二人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去病先生遗著。我非常高兴，当即表示研究会一定支持。南社三位创始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今《柳亚子全集》早已问世，《高旭集》亦已编入柳无忌先生支持的《南社丛书》出版，时殷安如、刘颖白所编《陈去病诗文集》还未付梓。而据我所知，殷、刘两先生耗费极大心力，然限于条件，所收作品主要根据已刊本或前人抄本，未刊手稿和散见诗文尚待访辑。遂建议张夷再多方请教从事南社研究的学者，更广泛地收集资料线索，尽可能琢成全璧，并最好由知名出版社出版。此后，又与著名学者、南社研究专家杨天石、郭长海教授以及上



海古籍出版社李保民编审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三先生皆慨然允诺，足见对整理出版《陈去病全集》俱持共识。

陈去病与南社诸先贤确实值得纪念和研究。

关于南社，一般都介绍它是“革命的文学团体”，大体不错，但稍失于笼统。我主撰的《中华文学通史·近代卷》，以及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近代文学”分卷主编时所撰词条，对“南社”都作如下表述：“南社，是二十世纪初以革命民主主义者为中坚，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共同思想基础，以振起国魂、弘扬国粹为主导文化思想的，全国性、近代性文学社团。”现在看来，末句文字还需作些修改，应称为“……以文学活动为主的，全国性、近代性文化社团”。如此表述，是因为我认为，需要对南社的政治特征做出更明确和更切当的界定，同时应该揭明其文化特征，而且强调其全国性、近代性的历史特征。在数千年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具有全国性、近代性的文学艺术家组织，南社是第一个。继此之后，第二个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新中国则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南社是今全国文联的雏形。仅此一项，就可见南社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所以一九八九年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成立时，由全国文联副主席尹瘦石出任会长，良有以也。

辛亥革命前后，南社飘发云起，海内风从，对思想启蒙、反清革命、文学和文化的近代化变革都起了重要作用。陈去病先生为南社中坚，贡献甚大，杨天石先生在《序》中已有详论，此处仅赘数语。

柳亚子《十一日得小进来书，以陈巢南、高天梅二君遗墨索题，并滕一诗，次韵奉和》一诗自注中，曾提到当时“时论谓章太炎先生为一民主义者，巢南似之；黄克强先生为二民主义者，天梅似之”。我和天石先生所见相同，以为这一“时论”不足为定谳。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反清革命志士都有“振大汉之天声”的民族情绪，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当时“排满”包括两重意义：“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民国成立后，陈去病又参加“二次革命”，坚持反袁，足证并不格于满汉之见，而旨在维护共和政体。中山先生曾说与陈去病“十年袍泽，患难同尝”（《陈母倪节孝君墓碑铭及序》），他们的政见是一致的。但从三十年代所作《卢青海招饮，话总理及伯先、英士诸公轶事》等诗看，他对当政者不顾民生、连年内战（“剿共”）是不满的：“苞桑大计曾何及，蛮触纷争可暂休。悲愤满腔谁与写，只将诗思压高秋。”而且应当指出，陈去病之民族主义思想，很重要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观其文集中《西藏改建行省议》，揭露“英人遂得乘机阑入，肆意要求，致成今日之局”，主张西藏建省。清道光间，龚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倡言新疆建省，自信“五十年后言定验”，至光绪中，果设新疆省。陈去病深崇龚自珍，此文显受龚氏影响，而作于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果建西藏自治区，得不可谓关心国计，谋略深远乎！

高旭曾说南社“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南社启》）。其“文学”二字还需考究。当时纯文学观念虽已传入，但还不占主要地位。所谓“文学”仍包括“文”与“学”，近于今之“文化”。这也是我以为南社当定义为“以文学活动为主的文化社团”的原因。在“文”的方面，去病先生尤以诗作成就最高。柳亚子序《浩歌堂诗钞》云：“以海涵地负之才，值草昧贞元之世，指陈事变，所南《心史》之伦；凭吊故人，唏发《西台》之亚。”柳亚子所称道的，主要是这几类诗：一类为指陈时事，抒写心志，多悲歌痛哭，沈雄愤切。第二类追咏汉族历史，缅怀宋、明遗民和抗清英雄，寄托反清革命之志。第三类为凭吊南社故人，伤悼革命烈士之作。诗风去华返朴，沉郁悲慨，也有些诗在写景中寄寓一种恢阔气势、昂扬情调。这些，前此多已言及。而《陈去病全集》则向我们展示并提醒我们注意他在“学”这方面的成就。柳亚子以治明史为主，陈去病则着力于清史，不知两人是无意合璧，还是有意分工。其《清秘史》及《明遗民录》等，宜为当今治清史者所重。晚年教授于东南大学、持志大学，二十年代所作《诗学纲要》、《辞赋学纲要》等（定稿于一九二七年），亦史亦论，在中国诗歌、辞赋研究学术史上当居一席。所辑《吴江

诗录》、《笠泽词征》、《松陵文集》等，更对乡邦文献整理有开拓之功。这些，都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二〇〇七年，参加苏州市政府举办的柳亚子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和上海金山“南社论坛”，曾与张左一、张夷及去病先生长孙陈世安、次孙陈放相晤。不意在陈去病故居还见到了陈去病三女宁利女士。后应圣竹印务公司沈小明之邀赴江阴，又得见陈去病四女即张夷之母明利女士。交谈中始知，他们文革前多年不敢提及是陈去病后裔亲属，十年浩劫中，更因惧怕受冲击，扃门钉窗，逃离居地；所幸改革开放，才各得其所，并能有整理先人遗集之意。听罢颇生感慨。尝谒先生故居，前院绿玉青瑶馆和家庙有所修葺，陈列不多，天井中孙中山亲题“二陈先生之墓”残碑犹在，而百尺楼已形斑驳。至后院，见一三间连通厅堂，堂内诸物杂陈，一问始知即“浩歌堂”，不觉恍然。遥想当年去病先生在此，“酒残灯灺，悲愤中来，听壁上弓砰然与刀鞘击响，辄瞿然徘徊起舞，泪簌簌下承睫，掩襟袖若雨霰焉”（《垂虹亭长传》，何等慷慨，而今已成遗迹，尚不知钓雪滩、垂虹桥安在否？同行者还有柳亚子外孙、中国工程院院陈君石院士和南京理工大学柳光辽教授，陈、柳两家本世交，他们也很关心陈去病遗集的编辑。杨天石先生和我曾分别与两位南社创始人的后人在绿玉青瑶馆前合影，这也是共同关注南社、关注《陈去病全集》的人一次留念吧。

二〇〇九年值南社成立百年之际，《陈去病全集》终于出版，南社三杰以及多位南社先贤遗集均已面世。而又适逢建国六十周年，忽然想起陈去病的两句诗：“差喜朝来新甲子，桃花春水满澄潭。”（《精卫连夕招饮，会其南去，余亦西迈，因以为别》）从一九四九年前推一个甲子，是一八八九年，是年光绪亲政。随后就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直至辛亥革命；而进入民国，则又遭逢袁贼窃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日，直至全国解放。陈去病和南社诸贤生活的这六十年，只能用贝多芬的两首乐曲形容：《悲怆奏鸣曲》和《英雄交响乐》。因此新中国的六十年，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新甲子”。其间也经历曲折，但终于迎来发展与和谐，故“差喜”二字也恰如其分。那么未来的“新甲子”，相信将更是一番“桃花春水满澄潭”的景象。这是《浩歌堂诗抄》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或许寄托着去病先生的遗愿，也不妨戏视之为诗谶吧。

应张左一、张夷先生之请，爰作是序，以志感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飏